

文化领导权重构的整体性治理研究

朱倬然¹,张 炜²

(1. 河海大学宣传部,江苏南京 210098; 2. 河海大学计算机与信息学院,江苏南京 210098)

摘 要:中国共产党从政治的高度确定了文化强国的策略,开启了“文化兴国”布局篇章,重构文化领导权的境遇凸显。而对文化领导权整体性建构与发展如何实现的逻辑追问和实践外显,是文化领导权重构的关键。文章运用整体性治理理论,对文化领导权进行中国式话语转换,提出文化领导权重构的整体性策略,从协同政党意志和政府行动、注重理论创新与阵地意识、整合政绩和各方利益、驱动社会多元参与等方面思考了整体性治理对文化领导权重构的适应性表现。

关键词:文化领导权;整体性治理;策略;适应性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13)02-0081-04

随着社会变革更为频繁和社会整合更为复杂,党和政府的文化领导工作不断面临着新的挑战:党的主流意识形态对民众的吸引力在下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其他领域的引导力在削弱;文化建设对社会主义建设全局的理论解释力、智力支持力尚有不足。对正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共产党而言,重构文化领导权是巩固、提升党和政府合法性、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内在要求。

一、文化领导权重构的境遇

当前,规则制定权、争夺话语权、信息发布权、文化领导权等成为国家综合国力竞争的焦点,由于国内外各种压力,中国被推到意识形态斗争的最前沿,社会转型、全球化和现代化等构成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诸多挑战。中西价值观共时共存、前后现代文化共潮共涌、主流意识形态与非主流意识形态共生共长的现象成为意识形态建设的现代性境遇。中国共产党从政治的高度确定了文化强国的策略,开启了“文化兴国”布局篇章,因此,加强文化建设,重构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文化领导权的境遇应然凸显。

1. 社会转型与现代性的严峻挑战

经过 30 多年的社会改革,中国社会已步入一个快速转型时期,经济体制发生深刻变革,社会结构呈

现深刻变迁,利益格局不断深刻调整,文化价值观念多元、多样、多变,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这些现象加剧了不同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消解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支配地位,不断侵蚀着文化领导权。同时,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现代性特征正以难以抗拒的力量改变着日常生活世界,资本逻辑、实用主义、消费主义等思维模式无处不在地深入到日常生活的肌理层面,给人们思想观念带来压力、迷茫和异化,影响社会民众的“同意”与“认同”,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解构与吞噬作用明显,“适应世界现代化的潮流而必然实行的市场化改革,以及在经济等方面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传统意识形态的地位及其话语方式都难免被弱化”^[1],这对文化领导权产生了巨大的消解作用。

2. 意识形态领域新变化的实践诉求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意识形态领域面临新变化、新要求。第一,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泛意识形态化”、“去意识形态化”与“再意识形态化”的绝对主义或相对主义争论,导致意识形态魅力弱化和“吸引力”降低。第二,多种经济的存在竞争、多元文化的激荡博弈、多样利益的纠结错位,削弱社会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加之信息化使文化传播突破时空限制,互联网“双刃剑”的负面效应,导致意识形态的控制力下降。第三,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文化霸权和文化殖民的强势入侵与渗透,民主社会

收稿日期:2012-09-13
基金项目:河海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84/409302)
作者简介:朱倬然(1974—),男,江苏大丰人,讲师,博士研究生,从事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主义思潮、新自由主义思潮、历史虚无主义和“普世价值”等非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的滥殇与挤兑,削弱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影响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认同。第四,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现代化成为共同目标,各个国家坚持共同的发展主题和对现代化的追求,会使得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会使得意识形态的差异和对立日益淡化。

3. 增强文化软实力的现实需要

随着文化全球化的到来,国家之间的竞争既包括由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等表现出来的“硬实力”竞争,也包括以文化和意识形态吸引力体现出来的“软实力”竞争,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任务更加艰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要求更加紧迫。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文化的统治所形成的物化和异化的生存样态越来越表现为现代人的普遍境遇”^[2]。文化帝国主义、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殖民主义的侵蚀和渗透的风险加大,对文化安全与发展构成威胁。文化安全问题的凸显要求建构合乎现实需要的文化领导权,从而为多元文化的存在提供合理性,为主导文化统摄、规范多元文化提供合法性,对增强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

4. 思想道德建设困境的内在要求

社会治理格局的多样化、复杂化以及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平等竞争、利益至上等理念大大拓展了人的主体意识。然而现代中国人生活在道德现代化的历史嬗变期,传统道德文化和伦理规范已经解体,现代道德体系和伦理规范尚未完整地建构起来。作为个体的思想道德教育对象正承受着新旧道德和伦理的冲突,尚未完全适应道德角色的现代性转换,而更多倾向于以自己的实践能动分析和选择思想道德教育所施加的影响。还有,思想道德建设理论研究工作和社会现实关照、解题能力不足与实务工作的工具理性偏执形成了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的巨大“鸿沟”,致使思想道德教育对象所恪守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和对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的共识信心经历着严峻的考验和冲击,对党和政府的信任也受到挑战,思想建设、道德价值观教育存在的目的性也遭遇质疑,这种无法回避的思想道德困境对文化领导权重构产生了极大的消极作用。

二、文化领导权的整体性治理策略

文化领导权重构是党和政府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和系统工程,是文化建设的终极体现,是一项整体性策略。在众多利弊得失与治理类型的讨论中,很

难看出究竟要用何种策略构建,才能使碎片化政府朝整体性治理迈进^[3]。因此,我们需要通过借鉴西方整体性治理的理论,对文化领导权进行中国式话语转换,从而提出文化领导权重构的相关策略。

1. 整体性治理的基本旨意和运作目标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以来,以整体性治理为价值核心的整体政府改革已在世界范围兴起与发展。“正如 20 世纪末新公共管理和再造政府所带来的变革一样,整体性治理是 21 世纪政府改革最鲜明的特征,对它的探索现在可能已准备就绪。”^[4]目前学界尚未就整体性治理形成较为准确的概念界定,但对整体性治理理论的基本旨意基本取得一定的共识,即整体性治理以公众需要为结果导向,政府通过协调、整合等方法促使公共服务各主体协同合作,为公众提供无缝隙公共服务。换句话说,就是为相关治理机构之间,共同强化服务的意义与目标,并在相互认同的方式中达成彼此同意的结果。在治理的组织结构上,整体性治理包括三方面的整合:首先是不同层级或同一层级上治理的整合,其次是治理功能的整合,最后是公私部门间的整合。为了实现上述整合,整体性治理主要从四个维度进行:跨组织的新方式、组织的新类型、服务提供的新方式以及新的责任与诱因^[5]。这些涉及的关键活动以及这些活动涉及的三个层面整合正是整体性治理的基本旨意。整体性运作的一个中心的、正式的目标是更有效地处理公众最关心的一些问题,因此,考虑四个关键层面(政策、顾客群体、组织和机构)的每一个层面的目标是有益的。政策层面的目标涉及对特定领域进行公共干预的整体目标;顾客层面的目标关注顾客的需要或帮助形成顾客的偏好;组织层面的目标是有效地管理各种组织关系;机构层面的目标是激活相关机构的活力。人们以不同的动机进行整合性的运作。在许多关系中,参加者并不享有共同的目标,但这一状况并不必然影响每一个参与者取得其自身目标的能力。大多数机构的整合性运作具有多种目标,但聪明和有效的整体性运作通常要求至少其中的一个组织有一个明确和一致的目标^[6]。

2. 文化领导权的中国式话语转换

葛兰西认为,“一个社会集团的霸权地位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即‘统治权’和‘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7],一是作为政治社会的“国家”,统治者通过政治领导权来实行统治,主要是使用军队、警察、法院、官僚机构等暴力机器;二是凭借对市民社会的“智识与道德的领导”,维持广大群众对政治权威的“同意”与“认同”;夺取领导权的主要场所是“市民社会”,实施主体是“有机的知识分子”,斗争的策略

则主要是“阵地战”。可见,葛兰西认为一个社会制度的真正力量并不是统治阶级的暴力和国家机器的强制性权力,而是被统治者对统治者世界观的接受,是建立在社会大众的“同意”与“认同”基础之上的文化领导权。进入中国式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文化领导权自然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即积极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并能引领社会思潮。首先,要重视和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积极占领文化高地,做到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积聚力量,不断夯实形成社会思想共识的群众基础。其次,要最大限度地调动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意识和使命感,造就当代中国的有机知识分子梯队,引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第三,要注重培育和扶持公民社会民间组织,给与其相对自由的发展空间,形成较为发达的公民社会治理基础。第四,要建立健全民情民意沟通机制和公平公正的利益协调机制,整合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及时化解矛盾冲突。最后,要重视文化意识形态的安全,防范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

3. 文化领导权整体性重构的路径

整体性治理理论针对公共管理碎片化问题而提出,政府服务和政府管理的碎片化是公共问题治理失效的根本原因,在其治理理论中强调政府责任,强调政府通过与市场主体、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人建立多种合作关系,以有效整合治理资源的重要性^[8]。按照整体性治理的基本旨意和运作目标,可以采取“纵横治理、主体整合、广泛协同”的路径重新建构文化领导权。党和政府在按照传统的自上而下层级结构建立纵向的权力线的同时,还应强调依靠各种合作力量建立起横向的行动线,强化以协同为特征、以结果为导向、以整合为核心,要把文化领导权重构的立足点最终放在当代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建设的现实路径探寻等问题的思考上来。落实到理论层面上,文化领导权重构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阵地,通过对时代本质和实践发展的理性思考,重视文化建设的质量和效益问题,积极寻找多元文化的有效整合点。落实到操作层面上,文化领导权重构必须以一定物质力量与制度形式作支撑,既要靠坚强的政治领导、雄厚的物质力量、完善的制度体制等硬实力条件基础,又要靠先进的理论引导、主流的价值观念、发达的文化产业等软实力条件保障;既要靠公共知识分子的积极作为、领导干部的科学治理等多元主体参与,又要靠丰富的社会资源、发展的公民社会环境,充分运用基础、文化、主体、环境等发展着的系统性结构整合推动文化领导权的建构与发展。

三、整体性治理对文化领导权重构的适应性

党和政府能够认识到文化领导权重构对于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增强文化软实力的必要性,但是文化领导权重构的社会系统性外部条件是客观存在并不断发展着的,其适应性表现才是整体性建构与发展如何实现的关键,所以文化领导权重构的逻辑追问和实践外显必须坚持整体性治理的适应性。

1. 政党意志和政府行动协同

实现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必须充分发挥无产阶级政党的作用。重构文化领导权,必须把党的领导权和执政权结合起来,坚持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坚持和完善国家根本政治制度,扩大和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改革中央和地方政权组织体系和民主管理体系,加强对公共权力的规范、监督和制约;继续发挥党和政府在文化领导权建设中的主导作用,坚持把政党意志和决策通过政府部门的依法行政作用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系统中,使抽象的政党意志、决策、要求转化为具体的社会行动,发挥政党领导力和政府行政力量的协同合力作用,使社会成员获得对政党领导和政府行为的“同意”和“认可”,从而为政权提供政治合法性与道德合理性的基石。

2. 理论创新与阵地意识并重

一方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指导地位,应当“自觉地在解决意识形态之价值困惑中提升其境界,自觉地在解决理论知识的困惑中开阔眼界”^[9],推动理论在内容形式、体制机制、传播手段等方面的创新,推动理论获得群众广泛的认同和接受,从而夯实文化领导权重构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要充分运用“阵地战”的方法和载体,坚守马克思主义阵地,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大量的事实证明,思想文化阵地,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的思想不去占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非无产阶级的思想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就会去占领”^[10],加强党对上层建筑领域的引导和管理,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增强社会主义文化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3. 利益嵌入与政绩推动整合

文化领导权建设不可能排除利益驱动因素,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和政府的行政执行过程只有从根本上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和价值需要,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加强社会管理,把不稳定因素化解在萌芽状态,实现利益的共建共享,真正使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才能真正获得群众认可。同时,坚持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

可持续发展的政绩观,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建立适应和谐社会要求的制度规范,要继续整合资源和社会力量,实现社会公平、增强社会活力,以公共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满足人民利益需要与个性发展需要,促进人的全面而和谐发展,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继续保持政绩合法性支持作用。

4. 多元支持与社会参与共驱

实践表明,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不能单纯依赖国家机器的强制力,而有赖于广大民众自觉自愿的赞同与认可,这就需要多元社会力量的支持。因此,既要充分利用社会支持力量,发挥行政部门和政府组织的管理活动的制度性力量,又要发展壮大“熟人社会”、企业、社区、非政府组织等多元社会力量的支持,还要引导广大人民群众主动参与文化领导权建设,合力推动文化领导权重构。同时,思想文化建设工作要联系社会实际,融入社会生活,契合社会心理,整合社会资源,服务社会大众,充分引导领导干部、科学工作者等“公共知识分子”积极介入并广泛参与,凝聚家庭、学校、企业、社区和非政府组织等社会化媒介力量从事思想文化建设,提高思想文化工作的实效性和针对性,巩固文化领导权。

参考文献:

[1] 侯惠勤. 弱化与强化:意识形态的当代走向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J].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4(6):3-10.

[2] 衣俊卿. 20 世纪的文化批判[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40.

[3] 彭锦鹏. 全观型治理理论与制度化策略[J]. 台湾政治科学论丛, 2006(23):66-99.

[4] 胡佳. 迈向整体性治理:政府改革的整体性策略及在中国的适应性[J]. 南京社会科学,2010(5):46-51.

[5] OECD. Policy coherence: “Vital for global development” [J]. Policy Brief,2003(7):1-8.

[6] 竺乾威. 从新公共管理到整体性治理[J]. 中国行政管理,2008(10):52-58.

[7] 韦艳,吴艳. 整体性治理视角下中国性别失衡治理碎片化分析及路径选择[J]. 人口研究,2011(2):15-27.

[8] 安东尼奥·葛兰西. 狱中札记[M]. 曹雷雨,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38.

[9] 黄明理,周晶. 论主体论视阈下思想政治教育者的眼界与境界[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4):14.

[10] 江泽民. 江泽民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97.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征订启事

(CN32-1521/C, ISSN1671-4970, 季刊, 自办发行)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贯彻“双百”方针,弘扬时代主旋律,理论联系实际,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为哲学与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主要刊登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社会学、法学、经济学、管理学等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性文章,可供上述有关专业的研究人员、管理人员和大专院校师生阅读与参考。《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为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入编期刊与中国学术期刊网入编期刊,2012 年入选 CSSCI 扩展版来源期刊。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由河海大学主办,每季末出版,国内外公开发行。2013 年每本定价 10 元,每本邮费 1 元,全年订费 44 元,欢迎广大读者直接向编辑部订阅。

联系地址:南京市西康路 1 号《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编辑部

邮政编码:210098

电话/传真:025-83786376

E-mail:sk1999@vip.163.com

网址:kkb.hhu.edu.cn/sxb/index_sxb.htm